

目

录

- 一、抗战胜利后为免征粮食营业税赴南京请愿经过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、邓晶平一伙的来龙去脉…………… (4)
- 三、硃石捷利电话公司简史…………… (5)
- 四、海宁选举“国大”代表的丑剧…………… (6)
- 五、孙中山先生海宁观潮记…………… (9)

抗战胜利后为免征粮食营业税赴南京请愿经过

张友伦、项定侯口述

一九四六年（民国三十五年），南京的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一项新的规定：今后对全国粮食业一律要征收营业税。消息传来，在社会上引起了人们普遍的不安。这不仅将更加加重升斗小民的经济负担，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，对整个粮食业来说，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。硖石曾是浙江省的三大米市之一，也是邻近各省产销粮食的转运集散要地，影响更大。为此，由硖石镇米业公会发起，决定发动全省有代表性的部分县市的粮商，组成一个请愿代表团到南京去请愿，要求政府收回成命，免征粮食营业税。

当时，张友伦是硖石米业公会的理事长，他把组织请愿，要求免税的建议一提出，就在同行中得到一致的赞同。为了扩大力量，争取胜利达到减免目的，便由米业公会派人至省会杭州，并分赴全省各地，争取有关同业声援。

请愿书的初稿，由硖石米业公会秘书项定侯起稿。内容主要是讲“谷贱伤农、米贵贫民”的道理，强调粮商虽属于图利的营业，但“以盈济虚，运余充无”，也对国计民生有一定的贡献（那时没有国家粮食业），同时，粮食集散，为购销过程中所不可避免，如层层加税势必提高粮价，攸关民食云云。总之，尽量使得要求减免征税的理由写得充分。

米业公会的人员带着请愿书来到杭州，正逢省参议会在杭州开会，为了争取不失时机地送上去，事先又请在杭州的海宁籍学者张宗祥（当时在杭州建业银行）斧正。他也表示同意。另外，还请了一些当时在杭的海宁籍人士帮助审阅。定稿以后，又由项定侯在旅馆里连夜重

新用毛笔抄写，以便赶在开会之前送去。

第二天我们到省参议会会议处，送出了请愿书。在外面等候消息。后来，据海宁的代表告知，议员中的态度不一，有的赞成减免，也有的认为商业应该征税，因此未作决议。这就更加坚定了我们要去南京请愿的决心。

经过分头奔走，获得了全省许多产销粮食的市、县同行支持。时在初夏，从各地邀请来的代表集中在杭州开会。会上又选出九名代表，其中杭州、宁波、绍兴、萧山（临浦）、嘉兴、平湖、湖州、硖石及余姚（缺粮县，代表十万盐民）各一名，组成“浙江省粮商赴京（南京）请愿代表团”。会后，代表团通过各种关系，如宁波卓葆亨（曾留学美国，与蒋介石秘书陈布雷是同学），严希常（与邵力子是同乡）黄桐生（与南京市长沈怡是知交），进行联系。此外，并由查人伟（海宁人）写了给邵力子和褚辅成的两封信，交张友伦（当时任副团长）带到南京。

请愿团来到南京，便分头进行活动。当张友伦把查人伟写的信交给邵力子时，邵先生很挚诚，约张友伦次日下午五点以后到夫子庙“大集成”酒楼雅座面谈。在谈话中，他建议我们：先备了花圈去谒陵，再举行记者招待会，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。代表团又到新街口一家报社去，找到一位姓屠的主笔，一了解，碰巧也是海宁同乡人，当时受到他热情的接待和支持。同时，我们又到朱雀路“和平旅馆”去，找到周仰松（杭州市商会常务理事），知道全国商业联合会这时正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。经过联系，同意把代表团带去的请愿书在会上散发，并向大会呼吁，以扩大影响。另外，我们也从周仰松那里得到一个消息，知道金润泉（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行长）和陈勤士（陈果夫之父）两位老先生次日将应邀出席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宴会，

我们就决定趁这难得的机会，托他们把请愿书直接交送给蒋本人。

为了将请愿书改写得简明扼要，从几千字压缩成几百字，代表团又找到了在南京的中央图书馆馆长、著名学者蒋复璁（海宁人），请他托人代作文字上的加工。等到改写好，已经是中午十一点，马上专人送到商联筹备大会秘书处，由南京市商会理事长王泽斋转给周仰松，再由周转给金、陈二老。

这时，到南京已是第四天了，请愿代表团谒陵也谒过了，记者招待会也开过了，呼吁书也发出了，还去过行政院和财政部，最后就等最高当局的消息了。到第六天晚上，金老先生告诉张友伦：“张家兄弟，你要我呈的东西已呈了，看起来有点希望，”据说他亲眼看到蒋当场阅后亲笔在上面作了批示：“交有关部门妥善办理”。在我们出门的第十一天，就接到财政部发来的电报：“你会呈主席避免粮税一案，本部经研究决定暂缓开征”。这次我们请愿的目的终于达到了。

当时，我们赶紧将这电报拍成快照，用挂号信分寄各地，全省同行闻讯都欢欣鼓舞。我们又乘热打铁，发起组织全省粮食业公会。会上推选嘉兴黄桐生为会长，张友伦为副会长，项定侯亦被选为常务委员，会址设在杭州横河桥。上海米业本来与硃石关系密切，这时也闻风而动，准备发起组织全国粮联。上海粮食业公会特邀我们同到上海，又据严振华告知，这是杜月笙的意思。当天张去见杜，讲了代表团赴南京请愿的经过。他要张参加即将成立的全国粮食业同业公会联合会。为了此事，张友伦又跑到南京，去找粮食部长徐堪。在全国粮食业代表大会秘书处，我们协助拟订，整理了一些有关章程。在筹备会上，宣读了会章，各地代表分组讨论，再由大会秘书处将各方面的意见汇总。第二天举行成立大会，出席的有全国各地粮食业的代表（实际上没有多少省，北方和南方几省都没有到）。会上，万墨林当选

为全国粮食联主席，张超为副主席，并选出了十三名常务委员。硃石米业的张友伦也是常务委员之一。原先，全国粮联还计划成立一个粮食银行，后因时局变化，这个计划没有实现。

那次请愿“胜利”归来以后，最后的结果是粮食营业税仅仅免征了一年——一九四七年。（张敬夫、程元霖记录整理）

XX

邓晶平一伙的来龙去脉

海宁在抗战期间成为敌占区后，长期盘踞在长安的日伪自卫队长为邓晶平。此人原名陈丙生，是国民党军队六十二师三六八团的一个侦察班长，全班有：刘兴、赖青、胡标、孙坤、周仁和、李胜和他一共七个人。一九三八年春天，萧山尚未沦陷，这批人由萧山渡江北来，在袁家坝东面名叫老鸦窝的地方落脚。这七个人自称是六十二师三六八团的先锋队，一到就在当地派粮筹饷，骚扰百姓。

当时，附近一个姓叶的，原在长安酱园店工作，和长安日伪维持会长苏某等熟悉。日寇长安宪兵队宣抚班知道这批人的情况之后，意欲招抚至长安成立伪自卫队，以华制华，就派苏、叶拉线，果然一拍即就。陈丙生等七个湖南人一到长安，立即组成了所谓自卫队，日寇派陈丙生任队长，并由刘兴带领胡标、赖青、孙坤等去袁家坝成立一个分队，由刘兴任分队长，就地招募了一批流氓地痞为队员。

陈丙生当上日伪自卫队长以后，又由叶锦昌介绍，结拜了一个“干爹”，姓潘，是开嫁妆店的老板。由于爹为他改名为邓晶平，给他介绍对象，在长安结婚，大摆宴席炫耀自己。

不久，刘兴在袁家坝也有了老婆。但刘兴一当上了分队长，便趾

高气扬，不把同来的弟兄放在眼里。因此，这几个人决定把刘兴干掉，重新掉转枪口反正。一九三九年春天，胡标、赖青、孙坤等乘刘兴从长安坐轿子回来时不防，合力把他打死。可是这三个人不但事先没有和萧山联系，事后也没赶快离开。长安方面得知讯息后，邓晶平当即派人到崇德，联络胡良玉游杂部队，派戴渭生带领队伍赶到袁家坝。天还没亮，已把伪自卫分队团团围住。结果，胡标、赖青、孙坤等都被抓去砍死在半路上。

邓晶平在抗日胜利后又投靠国民党，继续在长安一带作恶，解放后才被人民政府镇压。（朱国楹）

XX

硃石捷利电话公司简史

硃石捷利电话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一九一八年，创始人是硃石米市商何仲篪（新仓人）。当时他看到镇上商业日趋繁荣，水陆交通亦较方便，晚上照明已有人创办电灯厂，而通讯工具却还没有，于是就发起成立电话公司。最初装机约一百六十户，仅限于硃石镇，后来逐渐发展到全县各集镇都通了电话。至抗战初期，又衔接邻县兄弟公司并与硃石邮电局长途线贯通。用户如打电话至外地，在本县部分由捷利电话公司收费，通往县外各地长途话费则解交邮电局。

捷利电话公司原总股金一万元，共一百股，每股一百元，后又增资五千元。成立时曾向交通部注册，领有部颁执照。股东大会每年召开一次，由经理报告一年来盈亏及业务情况。公司从股东中推选经理一人，协理一人，均系义务职，不支薪金。只在每年年终时发给一点车马费，日常事务由会计负责处理，人事任免凭会计反映，由经理、

协理裁决。在抗战期间，各乡镇线路均被摧毁，仅存硖石镇上几十只电话。

抗战期间，由于原会计何季英已经病故，经理徐申如在卢沟桥事变后就离硖赴沪，协理许文伯也相继迁居上海。对硖石的捷利电话公司无人管理，任凭公司里的话务员领班摆布。情况传到上海，被徐申如得知，由徐邀集避难在沪的几位股东商议决定，致函在硖股东张友伦，授权给他暂代协理职务，接管整理。于是张友伦首先清查公司资产，在人事方面也作了整顿。后随着硖石商业发展略有转机，但仍未根本好转。抗战末期，经理徐申如在沪病故。一九四七年，乘移柩回硖之际，将经、协理改为聘任制，同时聘请唐燮卿为经理、张友伦为协理。（张友伦因属粮食行业中主妥成员，事务繁忙，只能兼职支半薪）

此后至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为止，原有乡镇线路逐步恢复，并贯通邮电长途台。解放后由私营改为公私合营，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。

（张友伦）

XX

海宁选举“国大”代表的丑剧

抗战胜利不久，国民党因发动内战，不得人心，已经日暮途穷，于是来了一出召开“国民大会”选举“国大代表”的丑剧。以示“实行宪政”“还政于民”。

当时，一些依附国民党的反动党派“民社党”、“青年党”等也想乘机分一杯羹，捞个一官半职，分占选举经费；一些政治投机分子便大肆进行活动钻出来参加“竞选”。国民党为了装潢“门面”，也让出几个国大代表名额。海宁县就安排了一个“民社党”的候选人徐润泉竞选国大代表。

徐润泉究竟是何许人，海宁人都不知道。据说他是在上海当律师的，有些“来历”。为了竞选，他特意从上海赶到海宁来，在县政府大礼堂摆酒请客，宴请县政府、县党部的有关领导和地方士绅。

那次，海宁组织了一个“选举委员会”由县长凌华任主任，县党部程森士和三青团吕文任副主任。

程森士对我讲：“上面已指定徐润泉当选，我们没有办法，只能照办”。我（张福堂）当时是国民党县党部监察委员，派我代表县党部章昌照是县政府民政科指导员，代表县政警，分头至路仲、庆云、祝场、沈士等地活动。

选举时的写票、检票、监察等都是由当地乡（镇）公所的工作人员或小学教师临时兼任的。他们为了要保住饭碗，免找麻烦，对于选谁，写多少选票等，都得听从我们两人指挥。我们在开始选举的上一天也召开了座谈会，规定第一天写某某人几票，第二天某某人几票，某某人几票……，所以在选举揭晓前都早知道了选票数字。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和程森士通一次电话，报告当日的选票数字。实际上这些数字早已全部记在我们的笔记上，不查看也知道了。因为这些选票都放在乡（镇）公所，被保甲长动员来选举的人根本不认识候选人，也不识字，只由代笔人问：“选某某人好吗？”一般的都点点头，就写上了，就是摇摇头也不妨照写，反正选举人不识字，而且来投票的人也极少，根本没有提出异议的。

在选举期间，不仅乡（镇）公所对我们酒饭相待，参加竞选的候选人如顾凌云（在江西省当县长）也请我和章昌照到他家作客。我们虽然不敢改变局面，但在保证徐润泉当选，应得半数票以上的选票的原则下，也使其他候选人相应得到比较接近的数字。

在提候选人名单时，我们还曾提名杭毅、朱奇生两人为候选人。

按规定每个候选人至少要有五百个选民推荐，我们发动三青团员签名很快达到此数，但名单送上去却没有批下来。最后参加县“国大”代表竞选的除了徐润泉外，还有许行林、祝仲时、顾凌云等人。结果让徐润泉以微弱多数“当选”。既完成上级任务，又使徐难堪。

作为选举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，我拿到了三个月的薪金。

（张福堂）

孙中山先生海宁观潮记

七十年前，也即一九一六年（民国五年）的秋天，孙中山先生曾偕同夫人宋庆龄及蒋介石、朱执信、叶楚伦等人，专程到观潮胜地——浙江海宁，观看了著名的钱塘江潮。有关这事，目前新出版的《孙中山全集》和《孙中山年谱》等都没有记载。当地父老相传，虽言之凿凿，却都“语焉不详”，即有人记述，也有不少出入之处。最近，海宁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在查找、搜集“民国”史料时，无意中发现了当年孙中山先生在海宁观潮时所拍的照片（复印件）和有关的记述，方才弄清楚了这个长期来为不少人所深感兴趣而又无法解答的问题。

由于钱塘江喇叭形的河口，以及水速、风向等有利于涨潮的因素都集中于此，有“得天独厚”的条件。因此，汹涌澎湃的江潮就成为“壮观天下无”（苏轼诗句）的奇景。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，就有在每年农历八月十八日观潮的习俗（见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）。宋代观潮都在临安江干，明代还在开化寺、六和塔一带，直到清代雍正、乾隆以后，江流变迁，^合盐碱间淤为陆地，杭潮始移海宁。据黄浚《花随人圣筵忆》记载，李拔可（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）曾告诉他，民国元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时的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（少川）曾经主张将海宁定为国都。这一计划后来虽然没有实现，但在民初时，人们对海宁这一地方的重视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这年的九月十五日，是农历的观潮节。孙中山决定来海宁观潮。事先与当地知名人士许行彬（注一）约定，要他准备肩舆（即小轿）十乘，许如约遵办。那天上午孙中山先生坐沪杭线头班快车到周王庙站（注二），随同孙中山先生来海宁的还有夫人宋庆龄，以及蒋

介石、朱执信、张人杰、叶楚伦、任凤 吴文瀾、孙棣三等乘舆到海宁县城（今盐官镇），县知事刘蔚仁，先在城外宜家桥地方（位于宁郭塘上）率领军警欢迎入城。至海宁县立乙种商科职业学校（注三）休息，由县署设筵两席，就在“商校”共进午餐。当时作陪的有当地士绅朱宝晋（稼云）、张鹏翔（步青）、沈冠英（冕夫）及张佐虞等多人。

饭后，随即步出南门，沿海塘登上占鳌塔（亦名镇海塔）东之“三到亭”（注四）。因此亭系新筑，故经过观潮亭而不登。其时正是中午。

二时余，潮水如万马奔腾，排山倒海而来。孙中山先生叹为奇观，赞赏不已。潮水过后，即在亭上摄影，在场的全体人员都参加合影留念，唯独孙夫人宋庆龄，虽经许行彬等代表众人一再邀请，以只有自己一个女性，婉言谢绝。临下亭时，许行彬请孙中山先生题一匾额。孙中山先生含笑应允。

回去时，仍乘原舆。孙中山先生以原来坐的蓝呢大轿（为他特备的）不便浏览观察沿途情状，提出与许云彬换坐一藤制小轿，并改道由长安上车，直接坐火车回到上海。这天，当地人民听说总理来到海宁，所经之处，道路两旁人山人海，争以一睹丰采为快。

孙中山先生回到上海后，不数日即给海宁许行彬等人寄来了一封谢信，信里有“燕处超然，鸥盟仍在”等句（注五）。请题的匾额，孙中山先生亲笔写了“猛进如潮”四字，交蒋介石寄给许云彬信里并有：“奉孙先生命，悬于观潮之新亭”等语（注六）。

孙中山先生的海宁之行，给了当地人民深刻的印象和很大的鼓励。海宁是辛亥革命党人杭辛斋、查人伟等人的家乡，人们一直牢记着孙中山先生“猛进如潮”的教导。孙中山先生在海宁留下的珍

贵的历史照片，当时曾有两帧，一帧为阎幼甫取去，另一帧一直由许行彬保存，挂在他的“~~养~~草堂”里。解放后有人曾见过原照，确知已毁于十年浩劫。现在发现的是解放前据原照翻印复制件，所幸人物面貌尚清晰可辨。至于那幅“猛进如潮”的题词，据许行彬说，当时他以城区自治委员是朱宝璋，委托朱制成匾额。结果匾额还未制成而朱病故。不久张人杰主持浙江，要这个题词，已经不明去向，仅由阎幼甫到许行彬家拿了一帧观潮照片去。据当地许多人回忆，“猛进如潮”这幅题词曾经悬挂在商校（后改中山中学）礼堂前，亦有人说是给海宁乙种商科职业学校的题词。抗战胜利后始获悉已由曾任海宁县长的顾达一代为保全。解放初期，尚有人在许行彬家见过这幅题词，字大径约十二公分，自右至左横书，~~海~~后许既病故，经十年浩劫，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物遂不知所终。

（注一）许行彬，（1874——1953）名祖谦，周王庙人。

前浙江高等学堂毕业，曾任浙江省参议会一、二、三届省议员兼浙江财政委员会秘书长、浙江国医分馆馆长等职。曾创办《良言报》及浙江《白话新报》。在这之前不久，因抵制袁世凯解散省议会，被判处四等有期徒刑。拘禁四个月后缓刑保释，思想消沉。孙中山先生对他自署“西湖闲人”曾表示大不为然。解放后病逝。

（注二）周王庙，沪杭铁路线上一小站，在海宁县境内，平时快车不停。距当时海宁县城六公里，仅乡村小道可通。

（注三）海宁县立乙种商科职业学校，简称“商校”，在海宁旧治盐官海神庙东侧大东门内，又称“马公祠”。

（注四）三到亭，原名“天风海涛亭”，在盐官海滨占鳌塔和原观潮亭（后名“大观亭”）之东，因前浙江省巡按使屈映光曾三次察看海塘，一些阿谀奉承者即将此亭易名为“三到亭”。今“中

山亭”系事后当地人士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来宁观潮而建，并非当年观潮处。

（注五）孙中山先生此信，据许行彬在解放前的一篇文章中谈到，他曾裱成立轴，当时还保存，但已遭虫蛀。今不知去向。

（注六）新亭，即新落成的“三到亭”。此时屈映光已下台。

附记：据许行彬为纪念此事所作诗注，当时海宁县知事刘蔚仁还大大的出了一次“洋相”，当孙中山先生问他“海宁人口多少”，时，这个糊涂县官竟瞠目结舌，回答不出来。

（海宁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）